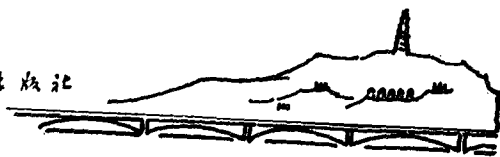


红旗飘飘

20

回忆少奇同志文章专辑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旗飘飘 (20 集)

本 社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37×1092 1/32 9印张 2插页 130千字

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定价0.58元



目 次

徐向前同志为本集题词

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 肖劲光 1

教诲十年,遗爱千秋

——缅怀刘少奇同志对党校工作的关怀 杨献珍 11

怀念刘少奇同志对新闻出版文化工作

的亲切教导 陈克寒 27

少奇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片断回忆 罗章龙 41

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 孟用潜 54

营救少奇同志出狱经过 杨一辰 66

党在白区工作中的楷模 王 林 70

永存的记忆 郭明秋 79

难忘的教诲 岳 夏 93

忠心耿耿 为国为民 师 哲 107

少奇同志教子记 刘 英 127

烽烟万里行 魏良彬 口述 139
徐国腾 整理

跟随少奇同志十九年

——机要秘书的回忆.....吴振英等
本刊记者 口述整理 164

在少奇同志周围

——警卫人员的回忆.....石国瑞等
本刊记者 口述整理 225

他心中只有人民

——医务人员的回忆.....耿德章等
本刊记者 口述整理 247

平凡的故事 崇高的精神

——保育人员的回忆.....杨淑梅等
本刊记者 口述整理 261

插页照片.....新华通讯社 中国图片社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供稿

封面画:刘少奇同志和安源工人.....侯逸民作

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

~~~~~

肖劲光

刘少奇同志遭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不幸逝世，这是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全盘否定少奇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并且诬蔑、攻击少奇同志早年“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事实与他们的诬蔑完全相反；但在那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对此我一直愤恨在心。今天，党中央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是深得人心的。少奇同志早年投身革命，为寻求革命、救国的道路奔走操劳。此后，他把毕身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的革命业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回想起早年与少奇同志相处的一段情景，萦绕于脑海之中，现记载于后，以资纪念。

我与少奇同志相识很早。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和任弼时、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六人经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俄勤工俭学。到上海后，我们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学习。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杨明斋，他是海参崴华侨的负责人。这个地方当时是毛泽东同志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工读辅助团（社会主义青年

团的前身)的一个机关所在地。它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楼上是机关办公的地方,楼下是俄文班学习的地方。我们到上海后,认识了少奇同志,他比我们先到上海,也和我们一起学俄文。我和弼时同志到俄文班不久,就加入了工读辅助团。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衣着朴素,举止端庄,态度严肃,从不开玩笑。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从此,我们相处在一起,从上海到苏联,又先后回国,到达安源,共同经历了两年多的风风雨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革命者有了希望,看到了光明。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等在组织了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之后,一九二〇年就改为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少奇同志和我们十多个青年,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聚集在上海学习俄文,准备出国。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并不很了解,只知道在那里工农当家作了主人;劳苦大众彻底得到了解放,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苏联政府关于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也于一九二〇年初传来中国。这一切都极大地吸引着我们。到俄国去,学习革命的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这就是当时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共同想法。由于目的明确,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功。

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作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在前面举旗竿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

除学习俄文外，每星期天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请人来演讲。我记得常来讲课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望道。他主要讲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本马列书籍。书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的大胡子像。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那时，我们这帮娃娃住在法租界，敌人对我们并不太注意，因为我们的革命活动才刚刚开始，也还没有直接地、尖锐地触及到他们，所以当时在法租界里敌我之间的斗争还不十分尖锐。法国警察当局也知道我们在渔阳里的情况，并不太管我们。我们几个人住在法租界菜市路的一个亭子间里，下面就是安南巡捕的一个岗亭，他们也不太理睬我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少奇、弼时和我一起由工读辅助团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们是第一批入团的。关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间，我只记得是冬天，究竟是一九二〇年冬还是一九二一年初，记不清楚了。后来我问过少奇和弼时同志，他们都说是一九二〇年冬。

我们在上海学了八个月的俄文和一些马列书籍。一九二一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一九二〇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通过杨明斋（杨明斋与第三国际和苏联在海参崴的党组织都有联系），介绍到俄国去。我和少奇、弼时等十多个青年当时都很兴奋。我们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一起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去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是在日本占领之下，而伯力已经由苏联红军控制。海参崴与伯力之间有一条伊曼河是分界线。河这边是“白”区，河那

边是“红”区。到了海参崴，少奇同志等几个负责人与海参崴大学教授伊凡诺夫接上了头，并安排了去伯力的行程。我们在一个小旅店里住了几天。天很冷，少奇同志和我们都挤着睡在一起。那时海参崴正发生鼠疫，凡是住旅店的进出都检查得很严。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的总领事馆对我们很注意。他们知道我们的姓名，从哪儿来的，误认为我们是孙中山派到俄国去的代表，抓了我们几个人去审问。被抓的有少奇、吴芳等同志。这几个同志都是我们的负责人，年纪也都比较大一些。听说在审问时，敌人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阵势，两边站着刀枪手，就象唱京戏那样。领事馆的人问少奇同志是干什么的？少奇同志沉着地回答说：是做裁缝的。因为当时南方人跑到北方来大多是做苦工或者是做裁缝、理发等手工艺活的。少奇同志是湖南人，讲湖南话，他们也听不太懂。不管怎么问，少奇同志始终讲是学手艺的。审问没有结果，威胁一顿，就把少奇等同志放了。回来以后，少奇同志讲了审问的情景，讲时神态自若。他那勇敢机智、临危不惧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虽然放我们走了，但并不死心，又通知驻伯力的领事馆注意我们；所以我们到了伯力后，领事馆就派人跟着我们。但是伯力已经是红军的天下，他们鞭长莫及了。我们到伯力后，一切都由红军接待，吃住都有人负责，就象到了家。在这个自由的新天地里，我们到处都感到亲切，感到呼吸舒畅。大家用不着装扮了，不用躲躲闪闪了，也不用装做互不认识了。少奇同志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我们大家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看到、感到的一切；在国内、在路上那种担惊受怕的情绪一下消失了，开始体会到

解放了的滋味。

从海参崴到伯力是分散成若干个小组走的，当时我和弼时同志一路。在伯力住了几天，集中了十个人左右，然后继续前往莫斯科。由伯力到黑河，分为两路，一路乘船，一路乘火车。我和少奇同志乘船，弼时、罗觉等同志坐火车。从伯力到黑河这条航线也不太安全，因为船在黑龙江上行走，有时走中国水域，有时走俄国水域。走中国水域时，有时会遇到鸣枪停航检查，但苏联船上的人对这一套都很熟悉了，有办法对付他们。一路上，少奇同志和平时一样很少讲话，遇事非常冷静沉着。我感到，在他的身上蕴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到了黑河，仍由红军接待。黑河的红军司令是一位老太太。中国侨民也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武装支队，打仗很勇敢，红军很信任他们，对我们也印象很好。没有几天，水旱两路人员集中后，我们又继续向莫斯科前进了。

从黑河到莫斯科我们都乘火车。由于缺乏燃料，火车开开停停，在路上我们大约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一路上，我们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情景。少奇同志是我们的一个组长，对这一段历程的见闻，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到过他的感受。当时苏联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暴乱，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战争的严重创伤和敌人破坏的严重恶果却仍历历在目。工厂、矿山被破坏停产，农村被洗劫一空，粮食歉收，物资极度缺乏。一路上到处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的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火车没有煤，要烧木柴，走一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边走边修，还要不断地和白匪

的破坏作斗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坐的是一辆装货的闷罐车。火车停下来之后，少奇同志与我们一起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在这样艰苦的旅途中，他始终精神振奋，并不时地鼓励大家。

一九二一年，我们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正逢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被分配到会议代表们住的一个旅馆里，与代表们同吃同住。有时代表大会开大会时，也发票给我们去旁听。少奇同志和我们都轮流去参加。我去过一二次。在听报告时，我们看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坐在主席台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被分配到刚刚成立起来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是一九二一年五月成立的，它的全称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其中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学生。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少奇同志和我们都在中国班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国际工人运动史和俄文。记得学习的课程有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共产党宣言》和有关工会运动的小册子等。我记得，当时共产国际对工会中的工团主义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学习中也批判工团主义。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举行东方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少奇同志和我们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一些人一起，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担负大会的翻译和文书工作。

在那之前，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同志和彭述之、

罗觉、卜士奇、吴芳等首先由团转党，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尔后少奇同志等几个党员和我们这些团员一起组成旅俄支部。旅俄支部成立后，任弼时同志和我先后于一九二二年由团转党。团员转党时，要有两人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按当时的规定，开支部大会时党团员都参加，通过党员时，党团员都举手。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少奇同志是旅俄支部早期负责人之一，是支部委员。此外，还有罗觉、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也是支部委员。在东方大学总支下面还有俄罗斯东方少数民族的支部、日本支部、朝鲜支部等。

我们在苏联学习这一段生活是很艰苦的，同时还有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捣乱破坏。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在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做工。凡是站岗的，每星期发给半斤到一斤黑面包。面包质量很差，有的上面都长了绿霉，有的里面有一段绳子，把绳子扯出来，面包中间就成了一个大洞。我们这些外国学生都享受红军的待遇。在苏联，当时红军待遇是全国最高的，那时列宁也只是享受红军一样的待遇。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是一块象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

吃，越等越饿。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的，不管脚大脚小，一人一双，皮鞋重得很，穿起来大一截子，鞋尖向上翘起。冬天穿一种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的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颗红五星。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那时年轻也不太怕冷。红军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人的生活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大学教授的报酬主要是面包。教授们背个兜兜，每星期六拿发给的面包票去领一块象牛屎一样的黑面包，放在兜兜里背回家，这就是一个星期的报酬，也没有什么钱。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那么几个人受不住那个苦，想退学。少奇同志却始终表现得很坚定，对自己严格要求，纪律性很强，有明确的革命事业心，能团结我们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坚持学下去。所以，我们学习得很好，团结得很好。

在东方大学有一次过年，学校组织晚会，在校学习的苏联东方民族和外国学生都要演出一个节目。少奇同志和我们几个人一起自编自演了一出反映中国的军阀、资本家如何镇压工人罢工的戏。少奇同志扮演工人，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扮演军阀、资本家和群众。大家一边排练，一边热烈讨论。当时对如何表现中国工人，大家各抒己见，少奇同志和大家一起讨论、争辩。他的演技虽然不怎么高明，可是态度十分认真，对每个动作都反复排练，尽力把人物形象刻划好。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少奇同志虽然看上去比较严肃，但有时讲起话来也很风趣。记得有一次谈到恋爱、婚姻问题的时候，少奇同志说：“外国人‘暴露’，中国人‘隐蔽’，实际上，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没有外国人深。”这些事离开现在已将近六十年了，当时的情

景仍历历在目，想起这些事，更增添了我对少奇同志的怀念，令人不胜感慨。

随着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些同志回国参加工作，所以第三国际就陆续从东方大学调一些同志回国。少奇同志是最早调离东方大学回国的，大约是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少奇同志回国后搞工人运动，不久就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我在一九二四年夏天回国后也到了安源，又和少奇同志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宣传游艺股工作，少奇同志是俱乐部主任。他工作很忙，经常下矿井到工人中去搞调查研究，代表工人与资本家进行谈判；有时找安源矿务局商讨如何改进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问题，维护工人的利益。他善于钻研问题，想得很深、很全面，往往能把一些看来平常的问题提高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当时资本家与帝国主义之间也有矛盾。为了防止外资乘虚而入，少奇同志既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又讲究斗争策略的灵活性，从而也就更好地做到了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些做法和毛主席当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时有不少工会相继遭到破坏，而安源工会却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中心之一，被称为小“莫斯科”。在少奇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开始我们只是在工人中做工作，后来逐渐扩大到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争取农民对工会的支持。每逢星期天，我们往往组织青年工人去农村搞宣传，演出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使得工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少奇同志深得工人的信任和爱戴，威信越来越高。

追忆往事，怀念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我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少奇同志，深感中国革

命来之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祖国糟蹋得几乎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一沉痛的教训要永远记取。现在，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拨乱反正，形势一天天好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们党在“四化”建设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最近召开的五中全会又确定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措施，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有了最重要的保证。尽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艰难险阻，但是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举国上下，同心同德，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发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加速“四化”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的时代就一定会早日到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同志的不白之冤已大白于天下，此时此刻，我怀着崇敬而又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一回忆，来告慰少奇同志在天之灵。



# 教诲十年 遗爱千秋

## ——缅怀刘少奇同志对党校工作的关怀

杨献珍

杨献珍

刘少奇同志自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七年，曾直接领导过马列学院，即高级党校的工作。这是中央党校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一套刻苦学习、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勤俭办校和教职员为学员服务的优良校风和传统。这一切都是同少奇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他对党校的工作做过很多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总结继承、发扬光大。

### 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

远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党中央就决定：“为着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马列学院的任务，为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知识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

中央发布这个决定

最激烈的决战关头，因此，形势的胜利发展，解放区的迅速扩大，使得补充干部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而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民主革命已经胜利在望，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战争环境转移到和平环境，为了适应这一转变，也迫切需要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当时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还要把一部分同志从实际工作岗位上抽调出来，到马列学院去专门读书，这样做岂不是与革命形势背道而驰吗？

不，恰恰相反，这正好表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

我们党一向重视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培养教育干部，特别是每当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期，更注意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新时期准备合格的干部。而在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中，办党校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我们党历来就有办好党校的传统。从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办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中央党校；从各个革命根据地，到处于地下斗争状态的白区，我们党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作好准备，所以，当时党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任命少奇同志为院长，充分表现了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同年九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讨论了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强调指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

少奇同志后来在对马列学院第一期、第二期学员的几次讲话中，也都讲到了通过办马列学院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重要意义，他说：“学习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对党和人民都很重要。”“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多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么大的

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理论是实践的指针，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的，无前途的，无生命的。有些人不懂理论，又要站到指挥台上，成吗？不成的，现在还可以，以后就不成了。”

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我们的党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一百多年世界革命的历史和六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马列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科学。不懂得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是无法正确地领导革命和指挥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遗憾的是，少奇同志在三十多年前向我们提出的这个忠告，并没有引起全党应有的重视，以致我们今天听起来仍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少奇同志还说：“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马列学院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将来还要办中级党校、初级党校，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理论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使全党理论有所提高。”

## 名副其实的院长

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们在七月底就紧张地投入了马列学院的筹备工作。在整个筹办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如寻找校址，选调哪些同志到马列学院工作，招生条件怎么掌握，以至招生考试出哪些题目，录取多少学员等等，少奇同志都亲自参加研究确定。八月中旬，他为我们拟定了第一期招生的试题和要求：“《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自拟一篇，写自己最熟悉的、了解比较深刻的问题。”并